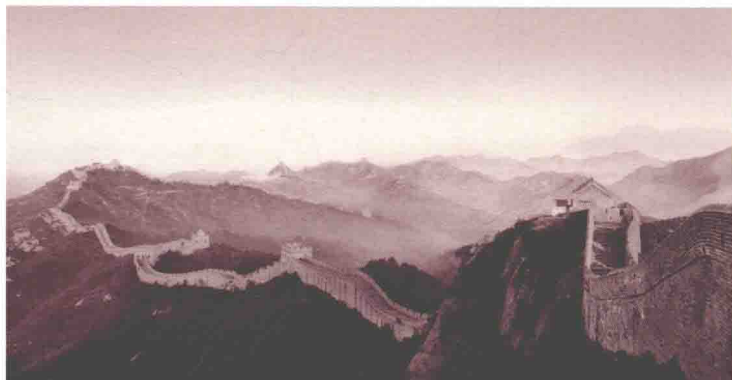


总主编：查明建

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系列丛书
Research Series of the Transl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to the English World



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

Howard Goldblatt and
His Translation and Promo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孙会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系列丛书

该专著获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科“十二五”规划项目

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

孙会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采用递进式的结构,沿着“译介”、“译艺”、“译道”的轨迹,首先对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的中国文学翻译进行概述,接着结合原文文本对其多部译作进行文本细读,分析不同译作的翻译背景、翻译特点和翻译效果,然后再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审视,从不同角度全面介绍葛浩文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推介,探讨葛浩文的翻译风格、思想、效果和得失,审视围绕其翻译引发的争议,最后尝试总结和评价葛浩文在向英语读者推介和翻译中国文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书适合所有翻译研究者、爱好者以及文学爱好者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孙会军著. —上海: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13-14586-4

I. ①葛… II. ①孙… III. ①葛浩文—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文学翻译—研究②葛浩文—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8771 号

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

著 者:孙会军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字 数:206千字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4586-4/I

定 价:49.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3.25

印 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5-83657309

有一天你突然说，“翻译就像是巴赫，我可以整天沉浸其中。它渗入了我的骨髓，我爱上了翻译。”^①

翻译是我的母乳，我不能没有它。一想到不能作为译者说话，我就觉得惶惶不可终日，好像丢了自己的命根子。^②

——葛浩文

①② 参见 Michael Orbach's paper "H. Goldblatt: the foremost Chinese-English translator in the world", (<http://site.douban.com/106369/widget/notes/134616/note/252321086/> 2012-12-13 01:51:34).

to you

the unsung, the uncrowned,
the poet, the aerial artist walking on a tightrope
between two words—two worlds,
the ventriloquist virtuoso speaking others' dreams in your own voice,
the bridge builder, working syllables and commas and periods,
the unrecognized academic producer whose scholarship
is appreciated only by the most cultivated.

Kai-yu Hsu

翻译家——

你既无人歌颂,又无桂冠加冕
你却是诗人,空间的艺术家
在两种语言,
两个世界之间
的一根钢丝上铤而走险。
你是天才的口技大师
在别人的声音中
述说自己的梦幻;
你是桥梁工程师
用音节和标点符号
把一座座雄伟的大桥营建;
你是未曾命名的学术带头人
只有文明社会中的精英
才会感激你的功勋和贡献。

(许芥昱 作 黄新渠 译)

总序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翻译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

其一,翻译观念、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重大转变。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文为中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怎样译”、“如何译得好”,目的是提出翻译标准、指导翻译实践、对翻译质量提出批评,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译文对比和评析。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更新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一个突破性的变化就是深刻认识到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并不是独立于译入语文化语境的语言转换行为。任何翻译都是在一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交流、沟通、协商。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文本,停留在翻译过程、翻译方法层面。翻译从翻译选择、翻译过程,到译本的流通、阅读、评价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特定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文学传统、读者阅读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操纵。因此,翻译是译入语文化对原文的“操纵”(manipulation),是对原文的“改写”(rewriting)。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已不是本源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是打上了译入语的文化烙印而进入译入语文学系统之中,成为译入语文学系统中具有独立文学品格的新文学作品。翻译作品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就获得了新的文学和文化生命。要想理解这个新生命,就需要考察该作品之译本形态及其生命基因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是如何被重构的。重构过程,既包括翻译过程之中文本层面的选译、改写,也包括翻译过程之外的评介和解读。因此,完整的翻译研究,包括翻译选择、译文生产方式、译作在译入语中的接受、评价等等这些

前后相继的环节。

“文化转向”增强了翻译研究的问题意识,对翻译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研究者认识到,翻译研究不能就译本而译本,而应回到翻译生产的“历史现场”,将译作放置在其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之中进行考察,才能深入到翻译现象背后,作出切合历史实际的探讨,由此而增强了翻译研究的思想性,提升了翻译研究的学术品格,因而也提高了翻译研究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学术地位。

“翻译”和“翻译研究”观念的转变自然也就促使了翻译研究关注点的转向和研究范式的转型,表现为:从寻找翻译规律,转向从翻译现象中发掘问题进行分析、阐释;从探讨“如何译”,转为探讨“为何译”、“为何如此译”;从译文对比优劣的评析,转向对译文背后所潜含的译入语文化因素影响的阐发;从文本语言层面,深入到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方面;从只关注翻译过程,转而将翻译看成是一个从翻译选择到译本流通、接受、影响效果的系统工程;从只关注译作的语言形式和特征,转而关注译作的文学性、文化性;从关注语言层面的转化,转而注重考察与译本相关的作品介绍、评价、研究,从文本性层面,扩展到分析译本所塑造的文化形象,等等。

其二,翻译研究对象的拓展。过去的文学翻译研究,以外译中为主,主要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接受,而对中国文学的外译研究甚少,且仅止于译介情况的介评层面。

随着中国作为经济强国、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加强对外人文交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塑国家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对外人文交流能力关系到中国的国际文化形象和文化影响力,更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议题应运而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中国文学走出去,而文学译介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表现形式,蕴含着生动而丰富的民族

文化基因密码和生命姿态。因此,文学译介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途径。然而,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现状、效果如何,成功的经验何在,中国文学的译介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等问题,成了“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中国文学译介研究丛书》正体现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努力。该丛书聚焦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探讨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选择、译介效果、读者接受与文化效应。在研究对象上,既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整体特征的分析、总结,又有对翻译家、作家作品、某种文学类型和文学现象的专题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既有译本层面的文本分析,又有超出文本之外,探讨译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考察中国人的文化理念、生存样态和情感体验如何在异域文化语境中获得重新表达。

《中国文学译介研究丛书》展示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又切合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战略的主题,兼具学术性和现实意义。丛书体现了一群致力于翻译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开拓努力,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切关注,以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文化思考和学术智慧。

查明建

2016年3月

序

进入师门有早晚之分,即使同时踏入师门也有长幼之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没有资格为孙会军教授的大作写这个序的。但是她来电相托,再加上我对这本书的研究对象又历来兴趣浓厚,也只好听之从之了。

记得我在十年前曾经在了一本杂志上面发表过两篇文章,分别谈到了葛浩文翻译的苏童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前者探讨了如何看待翻译对叙事视角的影响,后者则是触及到了叙事文学翻译的虚构问题。这两篇文章说明我始终对叙事文学翻译研究有一个关注点,那就是如何在叙事层面探究小说的翻译,这一探究的可能性、可行性有多大,单纯用叙事学理论考察小说翻译有没有深度和广度。虽然这十年来我研究的精力主要放在翻译的认知语言学和翻译诗学上面,但是这个关注仍然萦绕不去,并且总觉得小说翻译的叙事层面的研究是一个瓶颈,不容易突破。好在翻译学界这些年来不时会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孙教授的这部力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本书采用递进式的结构,从对葛浩文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概述,到对他的翻译文本的研究,再到上升到理论层面上的审视,也就是书中从译介到译艺再到译道的结构序列。

先谈谈我对“译介”的认识。顾名思义,这一部分主要概述了葛浩文所从事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当然,葛浩文的译介活动的主体是亲历亲为的翻译,尽管有时也会与人合译。除此之外,葛浩文还与人合作编选了英译的中国文学选集。选集类的书籍在西方起到一种标杆的作用,如果一部作品被选入文集,

那么就说明了这部作品被经典化了。如果一个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被选入了西方的文学选集,也就说明这位作家是经典作家,其作品无疑是经典作品。有权在英语世界里主编这样的文学选集说明葛浩文是一位中国文学权威。而这一权威地位的获得与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分不开的。葛浩文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着手翻译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迄今翻译的作品不下五十部,为中国文学在西方打开了一扇窗户,让西方读者有机会了解中国的现当代的叙事文学,更为重要的是为西方的学界提供了可研读的中国文学文本。这也就使葛浩文在中国文学译介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实,文学的跨文化引介有多种方式。除了直接进行文本翻译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撰写文学史。在英语世界比较突出的中国文学史是由夏志清撰写的《中国古典小说批评引论》和《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后者影响深远,而经由这部文学史推出的张爱玲和钱钟书引起了学界的瞩目,并且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至今余热未消。西方读者借助夏志清撰写的文学史了解了中国的叙事文学,也开始关注张爱玲和钱钟书这两位作家,可谓功不可没。相比较而言,葛浩文直接将作品转译成英语,西方读者可以直接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这种引介方式比起文学史的方式更加直观,效果也更加全面、显著。夏志清的文学史所做的工作是引介,葛浩文的文学翻译所做的工作是译介。前者可以让西方读者关注中国文学,而后者除了起到前者的这一作用之外,还能够让翻译的作品在西方文学世界中获得经典地位,使其跻身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葛浩文翻译的作家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证明了莫言作品在西方文学之林中的经典地位。孙教授的著作作为葛浩文的译介工作在莫言获奖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很好的说明。

“译介”这个词容易被理解成翻译是媒介、中介,所起的作用是介质的作用,用英语讲是 media 或 vehicle。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的作品永远是从源作品中派生出来的文本,是模仿品、次生品。这样的认识就会导致对翻译的作用以及其价值的贬低,译者的地位就会被湮没。这样,人们就会漠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译者葛浩文。相反,如果极端夸大译者的作用,就会无端地抬高葛浩文在莫言获奖这一事件中的地位。无论是朝作者倾斜还是朝译者倾斜都是对

他们关系的不当认知,都是不可取的。依我看来,葛浩文和莫言分别作为译者和作者很好地处理了各自与对方的互动关系:莫言赋予了葛浩文一定的翻译自由,允许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翻译的创造性;而葛浩文则给予了莫言相当的尊重,力图在翻译中还原原作的本色特征,尽管原作与译作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但这些不同还不至于改变原作的文本性。这样一种认知在这一问题上对葛浩文和莫言来说应该都是公允的。

为什么说葛浩文的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还不至于根本性地改变文本性质呢?孙教授在“译艺”部分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回答。这一部分选取了毕飞宇的《青衣》和《玉米》、姜戎的《狼图腾》、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呼兰河传》、莫言的《檀香刑》以及刘震云的《手机》及其葛浩文的译本进行了对比。对比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是从语言的流畅性着眼,有的是就引语模式进行讨论,有的是从人称的角度,而有的则是从人物的声音出发,等等,不一而足。在原文和译文之间所发生的这些差异,与其说是作为译者的葛浩文有意为之,不如说是英汉之间语言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有些地方葛浩文甚至会“连译带改”,这也是葛浩文依照英语语言本身对文学性在理解上的差异性要求实施的,所以不可以认作一种译者主体的“妄为”。当然,葛浩文的翻译既有得也有失,这是任何译者都无法避免的。好在这本书专辟一章予以分析说明。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及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在研究翻译名家时往往会为名家讳,让读者看到的都是名家的优点,往往对其缺点避而不谈,这样会适得其反,有损研究的客观性。

我在序言的开始就提到叙事文学的翻译研究有一个瓶颈问题,那就是如何从叙事的层面去观照此类题材的翻译。孙教授在书中其实多有涉及,如人称、复调、人物声音等等的翻译处理。这些常规性的叙事研究课题理所当然地需要去审视。但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企图,即能否从宏观的文学理论观照小说这类叙事文学题材的翻译。这些理论包括先锋派文学理论、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其实从葛浩文所翻译的作品的数量来看,完全可以根据这些理论对它们予以分类。拿一个个案来说,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具备鲜明的魔幻现

实主义色彩。那么,如何从魔幻现实主义角度去比较性地考察葛浩文的这部小说的译文与原作之间的异同,从而决定是否对译作进行重新的理论描述和题材定性,都是值得追问和探讨的课题。所以,如果我是这本书的作者,我就会不揣浅陋,野心勃勃地除了书中的译介、译艺和译道之外再添加一部分,即译事,也就是看看葛浩文对叙事是如何进行翻译处理的。当然,孙教授的这本书的主旨是研究葛浩文的译介活动,而文学理论的探讨则超出了既定的研究范围,不过这本书能够提示我们认知葛浩文中国文学翻译的理论空间还很广,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开拓和挖掘。

尤其需要说的是,在该书最后,孙教授运用了一个宏大的理论视角即东方主义来观照葛浩文的译介活动。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所谓“上纲上线”的多余之举,而是非常必要的理论提升。葛浩文的翻译近几年来已然成为一种现象,对其研究的成果也层出不穷。但是,我们到底该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放置在何种理论语境下去实施?这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终极性的思考,但也至少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书中很好地论及给葛浩文的翻译贴“东方主义”标签这一做法。如果真的贴上这个标签,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一种尴尬: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若是具有浓重的东方主义色彩,那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就无需沾沾自喜,因为葛浩文的莫言作品的翻译有着浓重的所谓的东方主义式的臆造。近年来又出现了“汉学主义”的提法。相比较而言,“后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都是对西方一厢情愿式的东方臆想的批评,那么,“汉学主义”则提出了当下汉学研究中中西方学者之间的合谋。这样看来,能否将葛浩文的翻译活动纳入汉学主义视角予以考察呢?那么,我们不妨沿着书中孙教授关于葛浩文翻译的非东方主义观所指引的思路继续探讨下去吧。



2016年2月于上海寓所

目 录

绪言	1
----------	---

第一部分 译介：研究、推介与翻译

第一章 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推介	7
第二章 葛浩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	21
第三章 葛浩文对莫言的推介与翻译	31

第二部分 译艺：翻译的得与失

第四章 语言顺畅、文化传真：葛译《青衣》	53
第五章 反复现象的处理：葛译《狼图腾》	71
第六章 葛译《骆驼祥子》是否有所超越？	79
第七章 引语模式的处理：葛译《骆驼祥子》	95
第八章 “第二”人称的处理：葛译《玉米》	105
第九章 翻译策略的调整：《呼兰河传》《檀香刑》英译中人物“声音”的 再传递	117
第十章 从《手机》英译本看葛浩文的“连译带改”	130
第十一章 得也译者、失也译者——葛浩文的翻译风格	139

第三部分 译道：葛浩文翻译思想探微

第十二章 葛浩文翻译思想研究·····	151
第十三章 葛浩文的翻译观·····	162
结论·····	171
附录·····	179
索引·····	186
后记·····	190
鸣谢·····	194

在当今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领域,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所有翻译家中的翘楚,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他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编写并组织翻译过多部中国文学选集,翻译出版了五十多部现当代中国小说。直到今天,葛浩文仍然不断推出译著,用译作等身、汗牛充栋来形容他的翻译成就一点都不为过。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说过,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几乎是葛浩文一个人在包打天下^①。他翻译的作品被刊载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以及《纽约客》上,《浮躁》《荒人手记》《生死疲劳》《狼图腾》《河岸》《玉米》都因为他的翻译而获得国际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离不开葛浩文多年以来的积极译介和出色翻译。他的译文使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国文学的魅力,使他们认识到,在中国也有可以和昆德拉(Milan Kundera)、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相提并论的作家。在笔者看来,葛浩文已经成为一种现象,非常值得研究。在本书中,笔者的考察思路和研究内容是这样的: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译介篇,用三章的篇幅从宏观的角度介绍葛浩文为了架设理解、沟通之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所进行的研究、推介与翻译工作。第一章介绍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推介。葛浩文无疑是个非常成功的翻译家,但是葛浩文的成功不仅仅简单地体现在他的翻译成就上,首先体现在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推介上,是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热爱、研究、推介,促发了他对这些作品的翻译。接下来第二章介绍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

^① John Updike, 见 Updike 2005 年 5 月 9 日发表在 *The New Yorker* 上面的书评“Bitter Bamboo: Two novels from China”。

文学(特别是对新时期小说)的翻译。他的翻译对象不限于小说,也有散文和诗歌,但小说翻译无疑是主打。在现代作家中,他主要译介的是萧红、端木蕻良、萧军、老舍、巴金等。而在当代小说家中,他译介的作家既有大陆的,也有台湾和香港的,而他最喜欢、翻译最多、译介最成功的当属莫言。鉴于葛浩文在帮助莫言及其作品进入英语世界获得国际声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本书第三章将专门讨论葛浩文对莫言的推介和翻译。

接下来的第二大部分——译艺篇,是对葛浩文文学翻译的实证研究,对《青衣》《狼图腾》《骆驼祥子》《玉米》《手机》等译本进行文本比较研究,结合具体的译本,考察葛浩文对于原文中信息内容是如何传达的、对中国文化专有项是如何处理的,对小说中的文学性表达是如何再现的、再现的效果如何,全面总结葛浩文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这些研究或许可以算是共时研究,但只有共时研究是不够的,因为葛浩文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其漫长的翻译历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他开始翻译到现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在这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其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有何改变?葛浩文于1979年翻译出版了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小说的合集 *Two Novels by Hsiao Hung: 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 Tales of Huanlan River*,这是他最早的译作之一。2012年底和2013年初,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翻译的莫言小说《四十一炮》和《檀香刑》先后出版,而《檀香刑》是他到目前为止比较新的译作。从《呼兰河传》到《檀香刑》,译者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是否相同?在本书第九章,笔者通过考察这两部译作对于小说人物“声音”的再传递,对葛浩文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进行历时研究,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葛浩文翻译手法的演变。第十章,笔者尝试以《手机》译文为研究案例,考察葛浩文在翻译中对原作的改动情况,试图结合具体的译例分析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存在“连译带改”的现象,对所谓的葛浩文式翻译——连译带改进行考察,在文本对比的基础上做出判断,我们到底是否能够用“连译带改”来概括葛浩文的翻译风格。本部分的最后一章——第十一章尝试通过具体的例证,研究和总结葛浩文的翻译风格。

第三大部分——译道篇,主要探讨葛浩文的翻译思想和葛浩文颇受诟病的“东方主义”文学翻译观问题。首先,笔者结合葛浩文发表的学术论文总结葛浩文的翻译思想。然后,着重探讨后面的问题。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葛浩文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

他作为翻译主体所做出的选择,但这也跟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脱不了干系。有学者认为,他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其实并非是一种自主的翻译,他一直都没有摆脱“东方主义”的禁锢。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葛浩文的中国文学翻译?难道我们一直被他的漂亮的英语译文所迷惑,一直被国外的奖项所蒙蔽,而没有看到他译文中的“东方主义”的倾向与企图?我们到底能否给葛浩文的翻译观贴上“东方主义”的标签?笔者不希望轻易给出结论。我们应该首先对葛浩文的翻译活动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结合具体的译本及其学术论文、译序等准翻译文本,研究葛浩文在翻译选材、翻译方法、翻译策略方面的特点,研究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动机,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最后,笔者认为,葛浩文研究有助于我们管中窥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接受现状形成较为清楚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的“走出去”战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有益的参考。